

引言和致谢

许美德

本书的出版得益于学者们的通力合作，包括本学科内部四位努力了解研究中国大学在21世纪初的大众化进程中已经发生了重要转型的学者，以及其他以不同方式做出贡献的学者。在2005年秋，我们申请到了加拿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the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Council of Canada）的基金，使我们能够研究1990年至2005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发生的变革，我们非常感谢他们提供的支持。在我们整合研究规划时，三个最重要的问题凸显出来，其重要性既对中国自身的社会政治体系、文化和经济的发展，又对中国与广阔的全球化社区越来越多样化的广泛交流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由于这些问题影响决定了我们采用的研究方法和我们在本书中提出的研究结果，因此通过列出这些问题来开始引言是非常适宜的。

1、随着中国迈向全球化的舞台，中国大学从其自身的文明中汲取了何种文化资源，这些文化资源是如何影响它们的行动的？

2、大众化高等教育进程如何推动公民社会的形成，以及有何种反映中国文明的民主形式展现？

3、大众化高等教育进程如何影响高等教育系统的多样性，以及入学机会和教育供给均等的结果如何？

这些问题向读者展现了本书的四位合作者的一些信息，他们的背景经历和学术兴趣。许美德一直致力于研究和反思在整个20世纪大学的演化过程中，支撑现代中国大学的文化价值观。而中国大学的发展，在不同阶段受到了德国、法国、美国 and 苏联大学模式的影响，与中国的科举制度以及在9世纪到19世纪繁荣的书院密切相关的文化价值遗产，持续影响着当代的中国大学。

¹这些中国文化遗产的影响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到1999年至2005年间，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阶段尤为明显。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领导人已经在政治外交中选择了新的方向，强化他们和非洲、拉丁美洲的联系，同时积极主动地和欧洲、北美地区开展合作。我们认为这些发展战略对反思中国大学的角色是

¹ Ruth Hayhoe, *China's Universities: 1895-1995: A Century of Cultural Conflict* (Hong Kong: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search Centr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9).

非常重要的。在现代化阶段，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启动了一个积极的文化外交政策，在世界各地建立了几百所孔子学院来传播中国语言和文化。²在这些学院的建立过程中，中国和海外的大学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中国政府通过国家汉语办公室，对孔子学院做出了相当独特的互利性安排。³这只是21世纪中国大学全球化行动的一个小型缩影，但是它引导我们去探寻，这些改革中的中国大学将会给全球化进程带来什么样的价值观，以及中国文化的哪些方面将对中国与世界其他大学的合作产生影响。倘若中国文明的资源是不同于西方世界的，那么中国文化在贡献新思想和产生看待全球问题的新视角方面，能否拥有一席之地？

我们的第二个问题，对于中国自身以及世界上其他一些试图了解中国并有意与之合作的国家而言，或许是同等重要的。在1990年到2005年如此短的时间段内，中国高等教育的学生数量已经从不足300万发展到了2,300万，这对中国政治体系、市民社会的发展和民主化产生了巨大的压力。⁴随着包括毕业于雨后春笋般迅速成长的私立大学的学生在内的大量毕业生在各行各业寻求工作机会，以及各级政府对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的需求日益增长，大学在社会的开放和民主中成为关键的行动者。林静的学术生涯一直致力于了解教育对最近几十年中国发生的重要社会变革的贡献。这包括一部重要专著《中国思维的开放》⁵以及一系列关于私立学校和私立高等教育的研究⁶。她在中国的背景下探讨了“社会资本”和“市民社会”概念，并阐释了这些术语在中国这样一个把自身定义为“市场社会主义”，并且深受儒家家庭社会观影响的社会中的一些独特内涵。

李军已经在中国古代教育史方面出版了很多专著，并在中国获得了在该领域的博士学位⁷，此外，他还从马里兰大学获得了在国际教育政策方面的第二个博士学位以及在东亚背景下研究公民教育的大量经验⁸。在2006至2008年，作为此

² Rui Yang, China's Soft Power Projec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46 (Winter), 2007, pp. 23–24.

³ Ruth Hayhoe and Ji'an Liu, China's Universities, Cross-Border Education and the Dialogue among Civilizations. In David Chapman, William Cummings and Gerard Postiglione (Eds.), *Border Crossing in East Asian Higher Education* (Hong Kong: Comparative Education Centr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Springer Press, 2008). pp. 76–100.

⁴ Jun Li and Jing Lin, China's Move to Mass Higher Education: An Analysis of the Policy Making from a Rational Framework, in D. P. Baker and A.W. Wiseman (Eds.), *The Worldwide Transform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Oxford: Elsevier Science Ltd., 2008), p. 271.

⁵ Jing Lin, *The Opening of the Chinese Mind* (New York: Praeger, 1994).

⁶ Jing Lin,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Private Education in China* (New York: Praeger, 1999).

⁷ 李军著：《玄、儒、佛、道教育理论比较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512页；李军著：《教育学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461页。

⁸ Jun Li, "Student Achievement in Social Studies in Urban Public Schools: China and Japan," *Education and*

项目的全职博士后，他在我们研究大学利用文化遗产对高等教育全球化发展问题（即研究问题1）和大众化高等教育如何推动公民社会发展问题（研究问题2）上扮演了重要的领导角色。

我们的第三个问题将我们带进了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比较研究维度，这一维度重点关注大众化进程中的多样化、入学机会和公平教育问题。查强在撰写博士论文过程中，对有关中国高等教育体系多样化的比较理论观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将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置于西方理论框架的审视之下，通过一系列量化方法，考察了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多样化进程⁹。他采用了组织理论的观点，包括人口生态，资源依附和组织同质等理论来分析中国进程和国际经验之间的异同。查强在教育决策过程方面也富有经验，并应用这些经验和技巧去探讨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中的政策发展过程。

研究设计

我们根据三个研究问题的宽度，做了一个将用三年时间来完成的研究设计。该设计分为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主要包括在国家层面上实施一个详细的政策发展过程研究，尤为关注该过程中高级政府官员、学者、学术机构、地方政府办公室的不同角色。在2006年秋，林静和查强在北京、上海、厦门和中国东南部少数区域做了一系列的调查，试图通过对学者、中央和地方官员的访谈收集一些资料，以进一步补充研究文献中对教育决策过程的理解。

本书的第一章，由查强执笔，主要展现了我们这部分政策研究的不同方面。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发现是：中国学者和研究者通过自身以及国家重点资助的研究项目，在决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表明了在中国社会中久负盛名的“实业型学者”（establishment scholars）模式的持续存在，他们通过提供知识和经验直接服务于社会，类似于传统中国的学者官员角色。通过有关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比较文献，政策研究还揭示了有关高等教育系统结构、入学、平等和质量的改革进

Society (Australia), Vol. 23, No. 3, 2005, pp. 35–54.

⁹ Qiang Zha, “Diversification or Homogenization: How Governments and Markets Have Combined to (Re)Shape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in Its Recent Massification Process,” *Higher Education: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 Planning*, Vol. 58, No. 1, 2009, pp. 41–58; Qiang Zha, “Diversification or Homogeniz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A Global Allomorphism Perspective,” *Higher Education in Europe*, Vol. 34, Nos. 3/4, 2009, pp. 459–479..

程的尺度。在这点上我们要感谢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研究学院的5位研究生刘继安(Ji'an Liu), 马近远(Marina Jinyuan Ma), 涂玉欣(Yuxin Tu), 王丽娟(Lijuan Wang) 和王小燕(Xiaoyan Wang)的辛勤工作。他们作为研究助手做了详细的文献回顾和梳理工作。

研究的第二阶段主要包括对中国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大学的一系列案例研究。我们希望展示自1999年扩招以来, 不同大学应对机遇、威胁和挑战的鲜活画面, 以及它们对未来的愿景、战略规划和关键决策如何反映中国国情中的不同元素。我们审慎选择了9所公立大学和3所私立大学, 因为我们开始这项研究时, 12%的扩招是由私立高等教育院校完成的, 而到了2008年, 这个比例已经增长到了19.4%。¹⁰中国在私立高等教育方面有长时期的优秀传统, 既在民国时期, 也在她悠久的历史中, 尤其是古代书院。尽管在1949年后, 私立高等教育被废止, 但在20世纪80年代, 它又复兴, 并在90年代末受益于大学扩招的新机遇而得以迅速发展。尽管当前与主要公立大学相比, 私立高等学校还处在完全不同的等级中, 但从长远看, 有一些比较优秀的私立大学已经显示了一定的学术潜力。这些私立大学往往通过打造强有力和丰富多彩的文化符号来提升它们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 比如: “黄河”, 被认为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 西安作为的唐代的首都, “鲤鱼跳龙门”与科举考试密切相关。“蓝天”, 对这些在社会中处于不利地位的私立大学而言, 意味着开放和包容。

我们在分析大众化阶段中国高等教育决策过程和结构调整中, 很明显地发现省属和地方层次的高等教育机构(包括私立大学)承担了扩招的主要任务, 而顶尖大学主要扩大了研究生的招生规模。它们得益于中央政府的重点资助, 使其能够维持精英地位并追求世界级的品质。既然我们的研究着眼点在于“究竟中国大学将如何对世界高等教育领域作出文化上的贡献”, 正如第一个问题所表述的, 我们决定重点关注顶尖的大学, 它们处在全球行动者的位置上。我们选取的9所公立大学中7所是985院校, 另外2所来自早期的211院校。在3所私立大学的选择上, 我们也着眼于选择未来具有扮演全球角色潜力的院校。

地理位置是我们选择案例的第二个影响因素, 我们希望能够确保所选的12所高校能够遍及中国的主要地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在不同地区之间存在着

¹⁰Jun Li and Jing Lin, “China’s Move to Mass Higher Education,” p. 272. Jian Liu and Xiaoyan Wang, “Expansion and Diversification in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No. 60, Summer, 2010, p. 7.

不平衡，其中沿海地区发展最快。根据中国国情，地理位置对于高校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不同地区经济拥有完全不同的经济条件和独特的高等教育发展历史。

第三，我们力求确保所选的研究案例能够代表主要类型的高等院校。因此，我们选择了几所主要的综合性大学，2所科技大学，1所农林大学，科技大学和农林大学是伴随着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计划体制出现的。¹¹同时，我们还选择了1所以教师教育为历史使命的师范大学，以及1所主要为少数民族服务的大学。影响我们进行案例选择的一个深层次原因是，中国政府在把国内几所重点大学扩大和提升到全球标准过程中发起的大学合并风潮。在案例选择的过程中，我们确保了所选高校既有合并组建的大学，也有完全拒绝合并的高校，还有自主选择合并对象而非简单服从中央政府指示的大学。

图1-1展示了所选12所大学在中国核心地带的分布情况。我们根据开展研究的顺序，将12所大学介绍如下：从本书第二部分开始描绘的3所综合性大学，分别是位于北京的北京大学，位于江苏省南京市的南京大学和位于福建省厦门市的厦门大学。第三部分的3所大学具有明显的教育学特征，分别是位于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位于中国西南部重庆的西南大学和位于吉林省延吉市的延边大学。其中，延边大学主要面向当地的朝鲜族人口。第四部分案例的3所科技大学分别是，位于安徽省合肥市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位于湖北省武汉市的华中科技大学和位于陕西省杨凌市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我们所选研究案例的第五部分包括3所私立大学，分别是位于河南省郑州市的黄河科技大学，陕西省西安市的西安外事学院，以及位于江西省南昌市的蓝天学院。

¹¹ Hayhoe, *China's Universities: 1895-1995*, pp. 77-80.



图1-1 本书研究的12所大学的地理分布情况

显然，大学的参与意愿也是影响我们案例选择的重要因素，因此有时难免要对最初拟定样本学校进行调整，但是我们仍然尽量确保遵循案例选取的既定原则，即学院类型及地域分布。在此，我们要向武汉大学的黄明东教授和华中科技大学的周光礼教授致谢，两位在2006至2007年，到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研究院（OISE）做访问学者期间定期参加我们研究项目的讨论会议，为我们研究案例的最终选择提供了宝贵建议和极大帮助。他们还对我们设计一系列相关的基本数据提供了宝贵的意见。这些数据包括收集相关大学从1990至2005年的招生、课程模式、师资队伍概况以及财务和预算情况。这些数据的收集，为12所高校之间的大体比较提供了坚实的实验基础。

本研究的另外一位重要的顾问是，安大略教育学院院长办公室负责国际学术事务的高级主管潘乃容博士，她给我们的研究项目提供了持续的支持。在该项目启动之前的一年里，潘博士已经和我对上海和杭州的大学负责人进行了一系列先

行访谈，并且对项目全过程保持不渝的兴趣。¹² 我们也十分荣幸地得到了来自意大利卡利亚里大学的柯琳（Cristina Pinna）博士的帮助，她是一位博士后研究人员，在她开展中国与欧洲学术关系相关研究的过程中，曾经用两个秋季学期参与我们的项目团队。¹³ 2008年5月的春季学期时，她去北京大学开展相关研究以及2009年5月她参加了在北大召开的项目结题工作会议。

案例研究的实际开展主要是2007年春天和2008年，在此期间，我们团队核心成员的足迹遍及12所大学。通常在每个大学由两位学者调研4至6天，主要访谈一些大学负责人，并且就焦点问题召开教工和学生参加的小组会议，旨在尽力洞察每个大学应对变革的举措以及在此过程中展现的精神风貌。然而，众所周知，获得大学的允许并且为研究的开展做好周到的后勤安排并非易事。因此我们在上述每所大学中，都邀请一位做高等教育研究的学者来帮助我们协调这些问题。因此，我们十分有必要借此机会，向为我们的案例研究提供无私帮助的13位合作研究者（以在本书中的出现顺序）表示由衷的感谢。他们是：北京大学阎凤桥教授、南京大学龚放教授、厦门大学谢作栩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的李梅教授、西南大学刘义兵教授、延边大学朴泰洙教授、中国科技大学程晓舫教授、华中科技大学陈敏教授和周光礼教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牛宏泰教授、黄河科技大学的汤保梅女士、西安外事学院的王冠教授，和江西蓝天学院的许祥云教授。

我们所选焦点小组会议的教师和学生代表着人文学科、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等大学的不同学科领域。各个大学参与合作的学者，在选择既愿意参加焦点小组（focus group）会议又能够在科研伦理审查（ethical review）过程中欣然提供必要个人信息的人员，发挥了关键作用。对焦点小组会议的教师成员而言，各个大学参与合作的学者，请一位副校长或高教所推荐，选择对我们提前准备好的需要讨论的问题饶有兴趣的教师参加访谈。对学生成员而言，按照我们的科研伦理规约（ethical protocol）规定，通过与学生理事会协商来确定人选。但是我们估计，参与合作的学者也会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比如入选学生相应地有较强的政治背景（党员，团员）但并非所有大学都是如此。尽管我们不能在严格意义

¹² Ruth Hayhoe and Julia Pan, "China's Universities on the Global Stage—Views from University Leaders,"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No. 39, Spring, 2005, pp. 20–21.

¹³ Cristina Pinna, "EU-China Relations in Higher Education," presented at an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The Dynamics of Transformation in East Asia" at 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October 24–26, 2007, and published in *The Asia-Europe Journal*, Vol. 7, Nos. 3–4, December, 2009, pp. 505–527.

上宣称焦点小组会议代表了各方的意见和声音，但是，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教师和学生的确表达了很多颇为有趣而又直率坦白的意见。

我们研究的第三阶段涉及到12所学校的学生调查。我们认为，关于入学机会均等以及高等教育大众化对教学质量和校园文化的影响方面，以及对公民社会和公民参与的体验方面，倾听学生的声音是十分重要的。在各个案例高校，我们均选择了分别来自人文、社科和科技专业的3个大学三年级的班级，每班人数在60人左右。我们邀请被试同学填写一份由我们的核心研究团队开发并试测过的调查问卷。尽管问卷涉及到一些敏感问题，但是，我们依然十分荣幸地获得了12所案例学校的调研许可，这个阶段的工作在2007年夏天顺利结束，由此我们能够于当年的夏秋两季，在多伦多大学几位研究生卓有成效的帮助下，开展数据录入工作。

在本书的第二章，李军展示了调查研究的主要发现，并且通过对中国和西方文献中核心概念的比较分析，对这些发现进行了解释。我们相信，这一章为我们所做的案例研究，尤其是那些来自“焦点问题小组会议”的发现，提供了必要的背景。我还要告诉大家，李军博士已经根据调研发现做了更加深入的研究，并且在国际相关杂志发表两篇论文¹⁴；同时，我们的两位研究生也正在依据调查数据，撰写博士论文。

21世纪的中国大学肖像

本书的主体部分描绘了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背景下的当代中国12所大学的肖像。在案例研究的草拟阶段，我们受到了伯顿·克拉克（Burton Clark）影响广泛的著作《创业型大学》的诸多启发。¹⁵克拉克根据各个大学创业精神以及其内生型变革带来的声誉，即大学经费从完全依赖政府投入到相当一部分资金来自非政府渠道的变化程度，选择了北欧的荷兰、英国、苏格兰、芬兰和瑞典的五所创业型大学作为研究案例。他尤其关注这5所大学课程、科研活动的创新特色，以及如何为当地或地区经济发展服务。

¹⁴ Jun Li, “Fostering Citizenship in China’s Move to Mass Higher Education: An Analysis of Students’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and Civic Participation,”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Vol. 29, No. 4, 2009, pp. 382–398. Jun Li, “The Student Experience in China’s Revolutionary Move to Mass Higher Education: Expansion, Transformation and Policy Choice,” under review. 刘继安的论文题目是 “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in China’s Move to Mass Higher Education since the 1990s.” 涂玉欣的论文题目是 “A Chinese Civil Society in the Making? Civic Perceptions and Civic Participation of University Students in an Era of Massification.”

¹⁵ Burton Clark, *Creating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ies: Organizational Pathways of Transformation* (Oxford: Elsevier, 1998).

克拉克的研究，主要通过收集5所大学的历史与现代发展的文献，并对各个层面的负责人进行访谈；他还关注了管理实践，课程，以及大学为了回应当地和地区公众需求而开展的科研创新举措。在沉浸在所收集的研究资料之后，克拉克开始思考创业型大学形成条件的扎根理论：一个强有力的驾驭核心，拓宽的发展外围，多元的资助基地，激活的学术心脏地带，以及坚定的创业信念即组织文化向重视开放性和变革的方向转型等五个方面。

罗伯特·殷（Robert Yin）在其关于案例研究的经典著作中指出，案例研究根据不同情况分为探索性和解释性。¹⁶我们在克拉克的案例研究中发现，他所进行的研究既有探索性，又有解释性。因为所选案例使他能够探寻和确认逐渐生成的创业型大学的概念，同时他也解释了使创业型大学成为可能的那些管理、组织结构以及财政供给等方面的变化。虽然建立了一个适用于所有创业型大学的宽广框架，但是他也确认了历史和地理因素以及各个案例学校的课程特色等关系到后来创业型大学身份认定的重要因素。

因此，对瑞典的查尔姆斯大学来说，从19世纪早期创建之初的一所致力于技术教育的私立机构，到后来融入公立教育体系之中，这个事实或许说明了该大学的创业成功。1796年因反对格拉斯哥大学的学院派作风，而成立强调“实用学生的实用艺术”的苏格兰斯特拉斯克莱德大学，也是同样重要的历史事件。¹⁷尤其是对于20世纪60年代在荷兰东部偏远地区建立的工科屯特（又译特文特）大学，以及课程主要集中在教师教育方面并且位于芬兰偏远地区的约恩苏大学而言，地理因素都起着重要作用。

描述分析每所大学的学术地位和创新定位两方面如何在本国高等教育系统内声名鹊起时，克拉克尝试着通过具体描述每个案例学校的特色，来强调和突出一两个主要的创新举措，进而寻求这些学校实现转化的共同原因。克拉克思路开阔的探索性方法提醒我们，在为了开展研究而进行的访问中，一定要认真倾听，仔细观察，避免把先入为主的理论或假设强加给研究。克拉克的研究无不警示了校史和地理因素的重要性。

当然，我们在研究21世纪中国的12所大学时的核心问题与克拉克所关注的问题差别很大。我们正在探求，能否发现一个正在形成的中国大学模式的轮廓。同

¹⁶Robert Yin, *Case Study Research: Design and Methods* (London: Sage, 1989).

¹⁸Clark, *Creating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ies*, p. 61.

时，我们的兴趣在于，这个轮廓是否与中国文化的核心元素、学术传统相关。我们关心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大学能够给世界带来怎样的文化贡献，这条主线引导我们就大学的理念、使命和战略规划等一系列问题访谈了不同层面的负责人。同时，也使得我们反映每所大学的发展历史，考察其最近时期的课程开发、教学和研究组织，以及科研政策和实践，以求论证正在形成的大学精神如何在这些大学的核心领域内得以体现。同时，我们也在尝试分析师生员工对大学理念和使命的理解程度以及他们与大学历史与文化的相关性。

除了收集诸如使命陈述、教学评估报告等相关文献，以及一系列基本数据和可以从访谈中得到的信息，我们更加希望能够用清晰可见的表达方式，来体现大学精神。因此，我们向大学的领导、老师和学生请教，请他们回答校园中的哪个建筑物或部分最能体现大学精神。因此本书能够在研究每个案例大学时，提供三、四张大学的照片，以及来自大学的为什么这里是大学“心脏地带”的评论，当然，在有些案例中，也提供了有趣的不同见解。

我们的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以及在大学内部和外部社会，扩招对于大学与政府关系、师生态度、期望与活动的影响。我们请大学的负责人告诉我们1998年颁布的《高等教育法》赋予大学法人地位这一举措对于大学的意义，以及大学在重大决策制定过程中的民主参与程度。我们向大学的老师和学生征求了他们对于公民社会的看法，还就他们是否有机会参与大学决策制定过程以及他们是否有机会加入外部社会中与其发展相关的正式或非正式的政治或社会组织，征求了师生的意见。

我们的第三个问题跨度很大，涉及到高等教育的结构问题、入学机会平等问题以及教育质量问题。在与大学负责人交谈的过程中，我们主要关注他们对于高校合并的态度，整合校园空间的方法，是否决定建立二级学院以及其他相关问题。在访谈教师和学生时，我们关注他们对于这些决策的理解，以及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对他们教学与学习经历和生活机会的影响。

经过长达四五天的倾听、观察、研讨甚至争论，¹⁸我们尝试为每所大学描绘一个全面的图景或肖像，随后再通过书面的方式加以概括。这个工作，使我们沉浸在由已有数据、相关部门文件以及来自访谈和焦点小组会议的大量信息构成的

¹⁸ 很多案例学校的领导、老师和学生，都提前研究了我們提出的问题，并且还因为我们的研究引起了他们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而向我们表示感谢。

汪洋大海中。有些时候，我们为了生动地重现访谈实况，需要仔细听访谈和会议的录音。每一个案例学校都有一个责任作者，他/她被列为第一作者，并且该作者负责在向其参与的研究团队的其他成员投入之前，草拟一个案例研究的方案。然后把这个草案提交给合作研究的中国学者，请他们提供可能的反馈、更正或扩充。此外，我们还邀请全部参与研究的合作者参加2009年5月在北京大学召开的工作会议，请他们提供对本书第一稿各章的建设性批评意见，并且对最后一章提出建议。我们非常高兴，参与合作研究的13位学者中的10位，以及其他几位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前来与会。在为期三天、议程紧张的会议中，每位学者详细关注了两三章的书稿，然后我们对话、分享和比较性地反思，力求全书内容准确、充分。后来我们尝试并且成功地把他们的观点纳入此书之中。我们还邀请了与会学者中的四位，根据我们书中所选大学的四种类型，提交了对于大学肖像的书面反思意见。我们还非常有幸邀请这四位中国学者参加了2010年3月在芝加哥召开的比较与国际教育协会(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ociety, 简称CIES)的年会。会议期间，他们提交的论文代表了在大学工作的中国学者对我们研究发现所作的有趣反馈。这些论文以专题的形式在2010年12月的*Frontiers of Education in China*刊发。¹⁹

我们描绘中国大学肖像的目的，不在于通过世界上的其他大学与中国大学开展比较测评，也不在于衡量中国大学模式与国际上的理论、标准和期待的差距，而在于为中国大学提供一个展示其21世纪发展图景的空间。在西方学术界，批评被看作是卓越性和真实性的必要条件，我们承认，本研究的组织方式可能会使得有些批评性分析显得不那么尖锐。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努力就不同观点展开讨论，倾听大学里的不同声音，并且在我们所描绘的“肖像”中有所反映。同时，我们认为得到大学领导人的积极支持对迎合我们伦理规约(ethical protocol)至关重要；但能有各校的领导和学者的直接参与，或许能够补偿由纯粹外部客观审查缺失所引起的不足，这对“肖像”的真实性大有裨益。

最后，这些肖像是否能够提供一个21世纪的中国大学模式，能否成功展现那些具有独特的历史、课程模块以及地理位置的大学选择路径的多样性，将由读者来评判。我们希望读者能把大学看作能够认同文明价值、具有人格的个体，并能

¹⁹*Frontiers of Education in China*, Vol. 5, No. 4, December, 2010, pp.465–578.

够对大众化进程中的机会、威胁和挑战，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

2006年，我出版了《中国当代知名教育家的思想肖像》，该书讲述了11位中国著名教育家的故事，在儒家教育理想和价值观念的背景下对他们进行了解读。²⁰每位教育家，都是在教育思想和实践两方面对中国高等教育贡献卓著的独立的个体。他们在中国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地区成长，并且供职于遍布中国主要地区的不同高校。因此，他们的教育理念千差万别，但是其中一条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主线，反映了他们所继承的共同的文化遗产。我希望这本书也能够达到类似的目的，呈现12所当代中国大学的肖像，通过参考其共同的中国文明遗产，以及反映这些大学近年来所享受到的从中央政府不断增加的自主权时，所采用视角和策略的广泛特征，来描绘和解释这些大学的共同特色。

自主权一词的使用，一定会引起本书读者的很多疑问。在当下的条件下，中国大学究竟拥有多少真正意义上的自主权？中国学者能够拥有多少西方语境下学术精英们最为看重的学术自由？众所周知，在1998年颁布的1949年以来第一部《高等教育法》²¹中，中国大学被赋予了法人地位。同时，该法明确规定中国大学的管理体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²²如同本书描绘的许多“肖像”那样，尽管中国的大学在招生、课程开发、科学研究、国际合作、院校合并、资产开发等方面享有越来越多的自主权，但是，大学也面临着一些清晰的政治限制。这些限制与每所大学党委的作用密切相关，党委书记几乎相当于大学理事会主席，而校长则对全部有关学术活动的重大决定负责。大学治理仍然是一个相当敏感的话题，但是在关于北京大学肖像的第三章中，读者将会发现有关“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个系统如何运转的详细描述。

在过去研究中国大学的二十多年里，令我一直感到困惑的问题是：西方传统之下的标志性条件“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能在多大程度上用来代表或反映传统和当代中国大学的核心价值观？在我看来，获得法律对大学法人行为的保护，对中国大学而言一直十分重要。从蔡元培这位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和柏林大学留学多年的中国学者改革北大时起，中国大学就已经从引进西方自治原则的努力中受益良多。然而，在关于大学自治的讨论中，中国更多使用的是“自主”

²⁰ Ruth Hayhoe, *Portraits of Influential Chinese Educators* (Hong Kong: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search Centr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6).

²¹ Higher Education Law, *Chinese Education and Society*, Vol. 32, No. 3, May/June 1999, pp.68–87.

²² Ibid. Article 39, p. 78.

(self-mastery)而不是含有法律或政治独立言外之意的“自治”(self-governance)一词。中国大学一直与国家保持密切的互动关系,一方面源于科举考试的稳定传统,另一方面也与中国学者直接服务社会的责任感有关。在这一点在一些“大学肖像”中得以明确体现,并且在本书的第1章和第15章有更加详细的描述。只有进一步打开思路,西方学者才能理解这“自主”这个词的真谛,而不能简单推定为“对国家的屈从”。

同样,特别适合西方语境下的大学、发源于理性主义认识论和二元论占统治地位的欧洲语境下的“学术自由”这个词,并不适合中国。一方面,相比西方而言,由于科举考试的历史以及当下中国大学与国家重大课题的紧密联系,中国学者更加处于“学术权威”的地位;另一方面,中国学者所享有的“思想自由”这一稳定传统,与植根于与欧洲理性主义认识论不在同一基础之上。这就要求首先通过行动证明知识对公众利益有好处,同时,知识被看作全面和相互联系的,而不是狭义地定义为单独的学科。中国学者发现,他们很难把批评停留在理论辩论层面,更多的是通过实际行动去证明孰是孰非,很多人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同样,中国学者不太愿意局限在自己特定学科范围之内,而是要求在更加广阔的视野之下批评当政者。²³在这一点上,与美国的实用主义以及1916年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提出之后发展起来的“学术自由”之间,存在着有趣的相似之处。²⁴

我将通过中西方学术机构在人名顺序方面简单但富有象征意义的互动合作来结束对本书的简介。中国人一直把姓氏放在名字的前面,但是为了表达对西方传统的尊重,大多数中国学者把姓名顺序颠倒过来,以适应西方读者的需要。我们认为,在本研究中使中国人名顺从于这样的“扭曲”是不自然和不合适的,因此,对于历史人物和中国大陆的学者和师生,我们的英文原版保留了他们本来的姓名顺序。

最后,请允许我向罗伯特·阿诺夫(Robert Arnove)教授表达诚挚的感谢。阿诺夫教授受比较教育研究中心(Comparative Education Research Centre,

²³ 这些区别已经另文详述。参见Ruth Hayhoe and Jian Liu, “China’s Universities, Cross-Border Education and the Dialogue among Civilizations,” in David Chapman, William Cummings and Gerard Postiglione (eds.), *Border Crossing in East Asian Higher Education* (Hong Kong: Comparative Education Centr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Springer Press, 2010), pp. 76–100, and Jun Li, “World-Class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Emerging Chinese Model of the University,” *Prospects: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Education Quarterly*, 4/156, December 2010.

²⁴ R. Hofstadter and W. Smith,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A Documentary History*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1), Vol. II, p. 874.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之邀，在书稿出版之前进行了审阅。他十分严谨，以极大的耐心通读全稿，并且对各章节需要说明和澄清的观点予以详细点评。阿诺夫教授的工作，对于准备本书最后版本的我们而言，是无法比拟的礼物，深受本书四位作者的赞赏。

(黄成亮 译)